

译学新论丛书

主编 张柏然 许钧

# 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

李 寄 著

32

上海译文出版社



H159/6

2008

译学新论

张柏然 许钧

# 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

李寄著

本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

青年基金项目

《周氏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翻译研究》

（项目编号：01JC740002）的成果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李寄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

(译学新论丛书)

ISBN 978-7-5327-4363-6

I. 鲁… II. 李… III. 汉语-翻译-文体论-研究  
IV. H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3509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

李 寄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53,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250 册

ISBN 978-7-5327-4363-6/H·793

定价:1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401196

## 总 序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译的认识几乎是零。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长期以来翻译家本身专注于翻译实践,忽视了对翻译问题的理性思考



与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误会。但是,丰富的实践与贫乏的理论之间所产生的这道深深的裂痕却不能完全掩盖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提出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而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翻译家们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因为它们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们对翻译理论思考的忽视,并不说明翻译就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种种问题因为翻译家的忽略便不存在。

总  
序

事实上,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翻译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着形式多样的丰富实践,虽然对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还没有以一种清醒的理论意识去加以关注,但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手法、策略,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体会,尤其是他们从中悟出的一些道理或原则,是一笔笔非常珍贵的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译事经验,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没有予以重视与关注,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被历史所尘封,无法发出其耀眼的光芒。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如前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维纳与达尔贝勒内、法国的乔治·穆南等,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将数千年来一直处在技艺层面的翻译经验纳入理论的思考、系统的分析与科学的探索范围。到了 70 年代,出现了以美国尤金·奈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他们不断拓展翻译研究领域,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翻译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后,翻译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被历史尘封的一笔笔珍贵的翻译遗产。他们一方面追踪历史上的重大翻译事件,将翻译家的实践置于宽阔的历史空间加以认识与定位;另一方面对伴随着翻译活动而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加以梳理与探讨。以现代学理对传统的翻译经验加以阐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深

化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被历史遗忘或忽视的翻译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果说翻译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冷落,处于历史边缘的话,那么正是借助现代学理,借助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从历史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

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们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如费道罗夫、卡特福德、维纳与达尔贝勒内、乔治·穆南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把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为翻译研究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翻译研究科学的性质,将过去近两千年来一直在经验层面讨论或争论不休的问题置在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但翻译活动十分复杂,涉及的因素多,范围广,有关翻译的许多问题,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社会、政治因素等问题,在语言学层面难以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翻译历史上的众多现象也无法得到辩证的解释。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途径暴露出的这些局限,不仅使其他学科理论的介入显得非常必要,更为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探索空间。

当回过头去,对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所走过的路作以回顾性的审视时,我们不难看到以下几点:一是翻译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未能达到的;二是翻译研究的途径得到不断开拓,各种翻译研究流派纷呈,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三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其他学界的关注与承认。在国外,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起,就有学者开始对50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如加

拿大的罗贝尔·拉罗兹、英国的埃德温·根茨勒,他们分别于1989年与1993年发表了同名著作《当代翻译理论》。前者以翻译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为核心,对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与思想进行评述;后者则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以不同的观点和重要著作为依据,将当代的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等五大流派。香港的陈德鸿与张南峰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收录了西方20位重要翻译理论家主要著作的部分章节的译文,这20位译学理论家中,除德莱顿、泰特勒、施莱尔马赫3位之外,其余17位均是当代的。根据编者的划分,西方译学研究界的这20位代表人物被列入6大学派: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除传统的语文学派,其余的5个流派都是近50年来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的绪论中,两位编者这样说道:“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或盛行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如果再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一些,还可列举出符号学派、交际学派、语言哲学派、文艺学派等翻译流派。从历史上长期以来“不入流”的翻译经验之谈到20世纪末令人眼花缭乱翻译流派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理论研究开始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透过这些被冠以各种名称的翻译思想或观点,我们不难看到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以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产生的研究成果被统称为“语言学派”,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参照的研究,被冠以“女性主义翻译流派”,总之,一种理论的介入,从积极的角度讲,都会给人们认识与研究翻译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确实为翻译研究拓展了巨大的空

间,为翻译研究注入了科学的活力,渐渐地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活动,涉及面广,若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无法揭示其性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必定具有综合性。但是,当各种学科的理论介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当我们在为翻译研究由此进入全面发展而欣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种种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种理论流派所认识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难以深刻地反映翻译活动的全貌。此外,在理论的层面上,从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看,还出现了“理论+翻译”的两张皮现象,有的理论只浮在表面,难以真正起到指导翻译研究的作用。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并吞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面对这一危险,我们不能不清醒地保持独立的翻译学科意识,从翻译学建设的高度去系统地探索翻译理论问题,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支持下主编的这套《译学新论丛书》正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具体体现。

《译学新论丛书》有着明确的追求:一是入选的课题力求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保证研究的质量;三是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的精神,力求有所创新。但愿在翻译界同仁的支持下,在各位作者的努力下,我们的追求能一步步得以实现。

主编

2007年8月18日于南京大学





# 目 录

Contents

导言	/1
<b>第一章 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的历时考察</b>	<b>    /29</b>
第一节 晚清翻译文体规范的遵循与接受的成功	/32
第二节 章太炎的影响与独异翻译文体的习得	/35
第三节 《域外小说集》接受的失败与传统汉语 翻译文体的悬搁	/42
<b>第二章 鲁迅留日前期科技文本的翻译文体</b>	<b>    /51</b>
第一节 鲁迅留日前期科技文本属于译作	/53
第二节 古文的语体、雅洁的风格与历史渊源	/58
第三节 亦译亦编的编译方法	/65
第四节 “兴世”的用心与“行世之文”的契合	/69
结 语	/72
<b>第三章 鲁迅留日前期文学文本的翻译文体(一)</b>	<b>    /77</b>
第一节 杂糅的旧白话语体 ——《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的语体	/79
第二节 杂糅的风格：夸饰与凝炼，油滑与阴冷 ——《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的风格	/86



- 第三节 杂糅的文言语体  
——《斯巴达之魂》、《哀尘》、《造人术》的语体 / 90
- 第四节 激越的风格与来源  
——《斯巴达之魂》、《哀尘》、《造人术》的风格 / 94

#### **第四章 鲁迅留日前期文学文本的翻译文体(二)** / 97

- 第一节 亦译亦著的译述方法 / 99
- 第二节 “宁顺而不信”的翻译理念 / 103
- 第三节 归化的翻译文化策略 / 106
- 第四节 “娱世之文”遮蔽了“觉世”的用心 / 117
- 第五节 翻译文体背后“少年人格”的呈现 / 121
- 结 语 / 124

#### **第五章 鲁迅留日后期及民国初年文学文本的翻译文体(一)** / 131

- 第一节 先秦语体及其正当性 / 133
- 第二节 《域外小说集》中的欧化因子及文体效果 / 154
- 第三节 朴讷的风格是晚清民初翻译风格的第三极 / 170

#### **第六章 鲁迅留日后期及民国初年文学文本的翻译文体(二)** / 175

- 第一节 直译的尝试与限度 / 178

目  
录  
Contents

第二节	“信、达”理念的现代性	/188
第三节	异化的翻译文化策略	/192
第四节	“传世之文”与“传世”、“觉世”的双重用心	/202
第五节	翻译文体背后“少年人格”和“中年人格”的 共时呈现	/207
结 语		/210
主要参考书目		/213
后记		/217

# 导 言

## (一)

导  
言

在鲁迅一生笔墨生涯中,翻译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翻译时间很长,前后达33年之久(1903-1936)。他的翻译字数约300万,与创作文字大致相埒,占据了鲁迅笔墨的半壁江山。鲁迅对翻译工作——自己的及他人的——十分重视,甚至一度“想以此作谋生”<sup>①</sup>,把翻译提高到了“正业”的高度。他从来都是把翻译与创作同等看待,痛恨轻视翻译、将翻译视作“媒婆”的议论和行为。寓居上海的10年中,他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译论文字,主动和被动地卷入了几次有影响的翻译论争。

然而,与作者、学者鲁迅收获的巨大的学术关注形成鲜明的对照,译者鲁迅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受到了不该有的冷落,这方面的研究显得相当薄弱。1980年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索引》(下册)收录了1949年10月至1965年6月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全书共456页,但有关鲁迅的翻译的,只占3页,共38项。<sup>②</sup>另外,收录1977年1月至1981年12月有关鲁迅研究的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4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鲁迅研究资料索引》(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65-268页。

文章的《鲁迅研究资料索引》(续编),全书共 675 页,但有关鲁迅的翻译的,只有 2 页,仅 16 项。<sup>①</sup>有鉴于此,2001 年彭定安先生在《鲁迅学导论》一书第八章指出了鲁迅翻译研究的薄弱状态,郑重其事地吁请人们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

令人欣喜的是,近 10 年来,上述的冷清局面正在改变。不独有关文章有逐年增加之势,而且几本有关专著已经出版或正在写作之中。在专著方面填补空白的还是一位域外鲁迅研究专家。早在 1980 年,西方便有人完成了以鲁迅的翻译活动为题的博士论文并以专著形式正式出版。<sup>②</sup>2004 年和 2005 年,国内又接连推出了两本鲁迅翻译研究的专著。<sup>③</sup>上述三本专著对译者鲁迅或鲁迅的翻译作了全景式的扫描,他们的拓荒的努力值得赞许,但这些著作只迈出了鲁迅翻译研究的第一步。它们或对译者鲁迅作历时的叙述,或作面面俱到的铺陈,还缺少有深度、有系统的专题研究。<sup>④</sup>

本论文不拟重复既有的全景式扫描,而是以翻译文体为理论支点,对鲁迅 1903 年至 1918 年间的传统汉语翻译文体作一个小角度的专题研究。要完成这一论题,首先必须明确翻译这一基本概念。具体而言,必须首先弄清 1903 年至 1918 年鲁迅的笔墨哪些属于译作。另外,尚须厘清翻译文体和传统汉语这两个核心概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鲁迅研究资料索引》(续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6 年,第 4855-487 页。

② Lundberg, Lennart. *Lu Xun as a Translator: Lu Xun'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1903 - 1936*. Stockholm: Orientaliska Studier, Stockholm University, 1989.

③ 刘少勤,《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与翻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 年。王友贵,《翻译家鲁迅》,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年。

④ 有关作者和研究者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王友贵在《翻译家鲁迅·序》中坦言:“以鲁迅的博大精深,鲁迅研究本身的长期积累与研究成果的深入同厚重,使得这样的一本书格外单薄,格外幼稚。它自身的问题一定不少。”同书第 6 页。对 20 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素有研究的王宏志如是点评王著:“不过,必须指出,这本有关鲁迅作为翻译家的专论不见得有什么突破的成绩。”参见王宏志,《鲁迅与左联》,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年,第 347 页。

## (二)

圈定研究的范围,确定研究的对象,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前提。1903年至1918年间,鲁迅的笔墨哪些是译作,哪些是著作,至今依然是个问题,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中外翻译史和现代翻译理论研究表明,翻译和著作(或创作)并不是人们常常以为的泾渭分明的两个界域。在现代翻译兴起之前,二者的界限相当含糊。在晚清民初的中国近代翻译史上,二者常常缠夹在一起,很难厘清。<sup>①</sup>具体到鲁迅晚清的笔墨,国内外学界在以下三方面存在争议:一、鲁迅留日前期科技文本的性质。国内学界和出版界一般把《说钼》、《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等科技文本当作著作对待,并收入著作文集。然而,鲁迅本人、周作人把它们当作译作。<sup>②</sup>二、鲁迅留日前期文学文本的代表作之一《斯巴达之魂》的书写性质。鲁迅本人对此说得含含糊糊,有时说是“作”,有时说是“译”。<sup>③</sup>近年来国内有学者著文

<sup>①</sup> 编辑了《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的日本学者樽本雄雄对此深有感触,他在《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载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8-162页。)一文中对介于翻译与创作之间的“译述”作了探讨,但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

<sup>②</sup> 关于《说钼》的书写性质,鲁迅明确指出它是译作:“一篇是‘雷锭’的最初的介绍,一篇是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的描写,但我记得那时的化学与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参见《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页。《中国矿产志》(附图一幅),亦为其所译……周作人的说法当是可信的。唐弢又说:“我们试把这本书和同一时期发表在《浙江潮》上的、由鲁迅先生个人署名的《中国地质略论》一对照,就可以看出内容和文笔完全相同……”(参见唐弢,《鲁迅全集补遗续篇》编校后记,《如果他还活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1页。)

<sup>③</sup> 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谈到《斯巴达之魂》时曾说自己当时“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又说它“看去好象抄译,却又年远失记”。在《斯巴达之魂》的前言中称自己为“译者”,说“译者无文,不足模拟其万一。”(参见《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页,第9页。)鲁迅明白地把《斯巴达之魂》判作译作。但是1934年,鲁迅致杨霁云的信中谈到《浙江潮》中所刊的文章时曾这样说:“《浙江潮》中……所作的东西,一篇是《说钼》(后来译为雷锭),一篇是《斯巴达之魂》(?);还有《地底旅行》,也是我所译,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参见《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03页。)他似又将《斯巴达之魂》视作创作。

为鲁迅争取该文的“著作权”；而有一位日本学者则坚持认为该文属于翻译，为此中日学者还爆发了一场论战。<sup>①</sup>三、关于鲁迅留日后期的系列论文的书写性质。国内学者一直将它们视作著作。可是有日本学者把《摩罗诗力说》说成“剪刀加浆糊的工作”，<sup>②</sup>暗示它属于翻译。北冈正子还倾十余年之力考据该文的出处，并写作了专著。<sup>③</sup>如果《摩罗诗力说》的著作性质动摇，那么《文化偏至论》、《人之历史》等系列论文亦不能幸免。因此这实在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笔者认为，对这些文本性质的论定必须回到晚清民初的语境中，照顾到翻译和编写或著作的两面。需要具体考察某一文本中翻译与著作（或创作）比例孰轻孰重，书写者有没有独到的见解，有没有一条独立的主线。另一方面，现代翻译学的成果有助于我们认定它们的性质。现代翻译学将翻译的范围大大扩展，把先前人们排斥在翻译之外的许多文本划归了翻译。伴随着现代翻译范围的扩展，直译和意译的二元方法被突破，中外都有多元翻译方法的理论建构，编译、译述、硬译等翻译史上的固有名词纷纷焕发新生，成为界定分明的理论术语。在吸取了中外翻译理论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建构了翻译方法的连续体。<sup>④</sup>依据笔者理论构架，本文将鲁迅留日前期科技文本和《斯巴达之魂》划归翻译。它们的翻译性质不是意义含糊的直译和意译可以涵盖，前者是亦译亦编的编译之作，而后者是亦译亦著的译述之作。对于以上文本的翻译性质和翻译方法的认定，论文正文将展开细致的考定。笔者认为，鲁迅留日后期的系列论文虽有翻译的成分，但来源较为博杂，其

① 参见吴作桥，《鲁迅第一篇小说应是〈斯巴达之魂〉》，载《上海鲁迅研究》，第4辑。樽本照雄，《关于鲁迅的〈斯巴达之魂〉》，载《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6期。

② 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页。

③ 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源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

④ 参见李奇，《论多元递换的翻译连续体》，载《外语教育》，1998年，第1期。

中著作成分是压倒翻译成分的。以《摩罗诗力说》为例,周作人在罗列出几个引证的书籍之后,仍认定鲁迅是“写《摩罗诗力说》”<sup>①</sup>,写作了第一部研究鲁迅翻译专著的林登伯格也认为《摩罗诗力说》是“独立的著作”<sup>②</sup>。另外,北冈正子倾十余年之力尚未穷尽《摩罗诗力说》的来源本身表明,说该文是翻译十分勉强。研究鲁迅翻译的一位同行也认为,这些论文“可以肯定,其中确有编译的成分”,但是“这些论文思想含量高,有鲁迅自己独到的见解”,<sup>③</sup>属于鲁迅的著作,更具体地说是他的编著之作。因此笔者把《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鲁迅留日后期的论文划归著作之列,排除在本论文研究范围之外。

鲁迅早年笔墨书写性质的勘别是鲁迅研究的奠基性工作,对鲁迅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论文在这方面拟作开拓性的尝试,抛砖引玉,以待来者。

### (三)

由于尚无可资借鉴的翻译文体的理论构架,在导言第三节至第五节中,在吸取创作文体研究的理论成果和译界前贤的相关论述的基础上,笔者尝试建构一个简要的既合适本题又具普适价值的翻译文体的理论构架。

翻译文体的理论建构可以从创作文体的理论建构和既有的与翻译文体相关的前贤的论述中获得较为丰厚的理论资源和宝贵的启示。

理解翻译文体得从对应的文体(即创作文体)说起。国内学术界对文

①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45页。

② Lundberg, Lennart. *Lu Xun as a Translator: Lu Xun'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1903-1936*. Stockholm: Orientaliska Studier, 1989, p. 47.

③ 刘少勤,《盗火者的足迹和心迹》,南昌:百花州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





体这一概念的见解和阐释聚讼纷纭,分歧颇多。但对于翻译文体的理论建构都不无启示。当下学界使用的文体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去理解。有论者认为:“文体有广狭两义,狭义上的文体指文学文体,包括文学语言的艺术性特征(即有别于普通或实用语言的特征)、作品的语言特色或表现风格、作者的语言习惯以及特定创作流派或文学发展阶段的语言风格等等。”<sup>①</sup>从语体和风格的基本层面去阐释创作文体,笔者认为同样适用于对翻译文体的理解。该论者对文体的理解是狭义的,把文体限定在语言学、文体学的范畴内,显然来源于西方观念。国内的论者大抵对文体作广义的理解。有论者认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sup>②</sup>这是以文体体式为基要层面,由此上溯到作家的精神结构和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和文化场域的更高层次。不拘囿于文体谈文体,由文体而及于背后的“人”、“社会”、“文化”,无疑大大拓宽和深化了文体研究,这是翻译文体建构同样必须留意和借鉴的。还有的人从作品的动态生成机制对文体加以考察,强调文体“不限于作品的既定形式,它还包括着作品的生产方式,是一具涵盖着创作准备到创作结果的整体过程中的许多艺术问题的动态研究系统。”<sup>③</sup>不把文体当作静态的对象去观照,而从其生成角度去动态地看文体,这个思路对翻译文体的建构颇有启示意义。

一个学术概念的建构除了向相邻的概念借鉴外,更得眼睛“向内”,从本学科既有的成果中获取支持。对于本题来说,众多的翻译家和翻译批

① 申丹,《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3页。

② 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页。

③ 白烨,《小说文体研究概述》,《小说文体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84页。